

四、二九座谈会和五、一四对话真相

——谨将此文献给我正在受难的中国同胞，

献给一切热爱民主与自由的人们

真小吉（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

负责人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研究生）

要求与政府领导人举行“公开、平等、真诚的对话”

是这次中国大陆掀起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北京的大学里们的

现代教育研究社

一项主要活动。大学生们在运动的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一要求，后来进行的绝食活动也是为了促使实现这一要求。大学生们希望通过真诚平等的对话，敦促政府加快民主^化进程的^化步伐。在政府方面，他们表面上接受学生的这一要求，但在实际做法上确是一再欺骗学生，使事态一步步的扩大激化。北京市长陈希同六月三十日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作的〈情况报告〉又一次完全歪曲事实，把破坏对话的责任栽在学生头上。本文作者现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将四、二九座谈会和五、一四对话的现场情况和背景公诸于世，以正视听。

一、关于四、二九座谈会

四、二七大游行后，政府方面表示要多层次、多渠道地与社会各阶层进行广泛对话。四月二十八日通知政法大学可派五名代表参加与政府的对话，其中学生会主席为当然代表，其余四名由各系推选。研究生院推选一名，本科生院推选三名。我作为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的代表出席了这次所谓的“对话”。四月二十九日下午二时政法大学派两辆轿车送我们五人到全国学联。进行后一位座谈会的工作人员要政法大学的代表稍候，说是有话要交待。我回答说，

现代教育出版社

有话对大家讲，不要只对政法大学的代表讲。对方回答，政法大学的情况特殊，要单独讲。我们等了近十分钟，别的学校的代表都上楼了，也不见有人来对我们单独讲什么。后来了另一位工作人员说，政法大学的代表可以入场了。我们走进会场一看，学生席呈了蹄形，正前面为领导席。学生席全已坐满，只剩最后一排给政法大学的代表。政法大学的代表商议好，由我来发言。临来前我拟好的发言内容总是“三点建议”，即要求政府同意与学生选举产生的代表进行公开平等的对话，对话之前要由双方协商对话的时间、地点、人数、方式。当我入座后，有人告诉我，今天

来的各校代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全国学联或北京市学联的常委、委员，属官方指定来参加的。我一听就明白了：今天这场“对话”不过是无关痛痒的故作姿态。当即我又写了一个声明，指出今天的会议只能算是一个初步接触的座谈会，而不是对话。政法大学的代表一致认为，我要抢先宣读这个声明，揭露事实真相。会议开始，首先是袁木做了较长时间的讲话。他的讲话尚未结束，我就举手要求第一个发言，大会主持人发现了我举手，点头示意让我第一个发言。中央电视台和其他新闻机构的记者全都围在我前面作好了录音、录像的准备。但就在这时候大会主持人忽然又

现代教育出版社

决定让北大的一位代表先发言。北大代表讲完后，记者又把录音录像器材放在我面前准备我发言。但大会主持人又继续让北航的代表发言。然后才允许我发言。我首先声明，不承认这是一场对话。这种一问一答的方式，一校一次的发言，互不连贯的提问，学校只涉及十六所，代表多为官方所指定。使人一看便知是一场闹剧。再加上袁木的诡辩、何东昌的耍横、个别代表的内应，这种“对话”肯定不能被大学生们所接受。宣读声明之后，我又提出了三点建议。声明和建议触到了袁木、何东昌的痛处。袁木当即板起面孔训斥起来，他认为对话就是座谈，彼此交换一下意见而

已，而不是对手间的谈判。我认为学生所要求的、所理解的对话正是一种平等的谈判。政府之间可以谈判、团体之间可以谈判、团体与政府之间也可以谈判。既然名为共和国，政府就应接受人民及其团体的监督。政府与人民及其团体之间的地位就应是平等的。平等双方的对话就是一种谈判。有明确的立场，有明显的分歧，双方对此各抒己见，力图达成共识。在国际关系中，对话即指谈判已为常识。在国内关系中亦如此。袁木把谈判的双方的关系看成是必然的敌对关系，这是他无知的表现。当然对一个曾封建专制政府来说，听到人民提出要与之谈判是很难以忍受

现代教育研究所

的。它从来就没有把自己与人民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同时在它看来只有在具有相同地位的人之间才存在谈判，所以这种政府是不会接受谈判这个字眼的，李鹏、袁木之流也不会把对话理解为一种谈判。在我的发言之后又有一位北航的同学站起来声明，不承认这是一场对话，随即退场。座谈会快结束时，政法大学的另一位代表，北高联的第一任主席周勇站起来发言，他说北高联完全是一个合法组织，并质问袁木、何东昌有什么根据说北高联是非法组织。何东昌当时拍着桌子嘶喊，我们不承认北高联，我们是应全国学联的邀请而来的，否则我们不会坐在这里与

你们的谈话。看到何东思这付嘴脸，我和周勇早就站起来宣布退席。这一段录像当晚没有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被删去了。这次“对话”当然不会被学生所接受，当晚就有许多学校贴出声明不承认这场对话，认为是政府在愚弄学生。要求真诚平等公开对话的口号迅即响遍全北京。不久由北京各高校推选出来的代表组成了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积极准备与政府正式对话。

二、关于五·一四对话

现代教育研究社

五月三日下午北京各高校代表在北师大开会，宣布成立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与会代表推举我和沈彤为代表团负责人。代表团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有四十多所学校代表参加。代表本身有的是北高联的成员，有的是校学生会的成员，有的无任何背景。我们的原则是，只要是由所在学校普选或推选出来的就行，不当然排斥任何一方。五月五日下午对话代表团在政法大学教学大楼六层召开第一次会议。会上决定代表团就设在政法大学。会上通过对话的三大内容，即：关于正确评价此次学运，是一次自发的爱国民主运动，不是动乱，要否定四·二六社论；关

于切实履行宪法第35条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言论、出版、结社、游行、集会、示威等方面的自由，具体归结到《世界经济导报》的问题，要新闻自由；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游行十条》违宪的问题，要游行自由；和北京高联的合法地位问题，要结社自由；关于如何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民主化进程的问题。会上指定由我和另一位同学起草给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要求对话的请愿书。五月六日下午，我和沈彤等四位同学向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递交了请愿书。五月七日上午政法大学领导派一学生通知我，说信访局昨夜来电话，约我五

现代教育研究社

月八日上午十时去谈谈。五月八日上午十时我和沈彤来到中办信访局，这次是局长郑幼枚与我们会谈。他听取了我们对请愿要求的解释后，主要询问对话代表团是怎样成立的，代表来自哪些学校，如何产生的。最后说五月十一日由我给他打了电话，看中央如何答复。同日下午对话代表团分成三个组，各负责一个专题进行深入研究，成员多为法律、经济、哲学、历史、文学、理工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社会各界对我们的期望很高支持也很大，送来各种有关资料供我们分析结合。还有许多来京上访申诉的人把他们的申诉状给我们，希望我们能在对话时反映他们的冤屈。全国

各地每天都有大量的信件寄来表示支持。五月十一日我接
 约与郑幼秋通电话，回答说中央正在研究我们的要求，本
 周内可能有答复。五月十二日晚十一时我外出回校，找妻
 子正在我宿舍里等我，她告诉我刚才有一位代表团的同学
 陪中办信访局的人来找我，说有急事要与我商量。见我不
 在，中办信访局的人就要这位同学同他们一起去中办信访
 局谈谈。将近十三号凌晨时我接通了中办信访局的电话，
 这位同学告诉我，中办通知，政府同意对话，为使对话能
 更有效地进行，政府方面希望参加对话的代表不宜过多。
 时间紧急，~~我考虑了片刻~~来不及与代表团大多数成员商议，

现代教育出版社

我考虑了片刻回答说，对话代表团将派二十名代表与政府
 对话。中办当即表示同意，并要我上午十时将二十人名单
 送交中办。五月十三日上午十时我来到中办信访局，向郑
 幼秋局长递交了二十位对话代表的名单。时间是五月十
 五日。但就这次对话的名称和新闻采访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郑幼秋说这次对话是政府与北京部分高校的学生之间的对
 话。我说这次对话应是政府与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之
 间的对话。不用这个名称就说明政府不承认对话代表团。
 我一再强调，我们不反对政府与其他学生举行对话，但我
 们所要求的是政府应与我们的对话代表团举行的一次专门对

话，以避免再次出现四、二九那样的“对话”。事后我才知道，关于名称的分歧当中隐藏着一个小骗局。政府本不想与我们的对话，他们的准备在五月十五日再搞一次类似四、二九的座谈会，把对话代表团放在这个座谈会上，与其他学生一起谈。他们要求我们的少派些代表，而实际上他们已向北京各高校发出通知，要求各校派代表，加上我们的对话代表团，人数将达二百。这样的对话，其结果可想而知。而陈希同在他的〈情况报告〉中颠倒事非黑白，说是学生先提出二十人名单，后又提出增至二百人。这种手法实在太无耻了。我提出二十人名单是应中办的要求，为了使对话

现代教育研究社

更富有成效。至于人数增至二百，完全是政府方面的安排。通知我的话完全自相矛盾。第一分歧是关于新闻采访。我提出对话要有中央电视台向全国进行现场实况的播映，并要有中外记者在场。郑动秋一听就拍着桌子站起来，说中国人的事情为什么要让外国人来插手，还说现场直播技术上做不到。我回答让外国记者、港台记者在场并不是让他们插手中国的内部事务，只是为了提高透明度。鉴于以往经常出现新闻报道失实，所以我们的要求有中外记者在场。另外，电视既然能对一场围棋比赛、一场排球比赛进行现场直播，为什么不能对一场如此重要的、全民关注的对话

进行现场直播。回到政法大学，我得到消息，政府准备十五日在迎接戈尔巴乔夫的同时与北京部分高校的学生进行“对话”，已通知各校团委指定出席人员。而对话代表团只是一小部分参加这个“对话”。下午五时许郑幼枚给我来电话，我问他如何解释此事，他问我从何得到这一消息，我说你不用问我从何得到这一消息，你先回答有无此事，他只好承认有这种安排。我说对话代表团不会出席这种“对话”。我们不仅对政府与其他同学对话，我们所要求的只是政府与对话代表团单独有一次对话。我们所准备的问题集中反映了北京大学生和其他各阶层人民最关心、最需

现代教育研究社

要解决的问题。最后郑幼枚约我十四号上午十时去中办信访局会谈。十四号上午十时我和沈彤再次来到中办信访局。我说学生方面是坦诚的。我们事先告诉：政府方面我们将要谈的问题，事先提供了出席对话人员的名单，时间和地点都充分尊重政府官员的工作方便。我们所要求的就是政府单独与对话代表团举行对话，并要有中外记者在场进行直播。而这两点正是政府所要极力回避的。正在僵持时，来了个电话，郑幼枚听过电话后对我说，中央同意与对话代表团举行对话，时间就在今天（五月十四日）下午两点至八点之间，由学生决定，地点设在统战部会议

厅。但现场直播不行，技术上办不到。中国只有两辆电视直播车，一辆在北京机场，一辆在虹桥机场，都是为迎接戈尔巴乔夫用的。我说北京的大学生的一致要求对话要有现场直播，我作为学生代表无权擅自作出违背学生意愿的决定。如果是技术上的困难，对话可以改在中央电视台彩电中心举行，那里设备齐全，无需电视直播车。我也希望广场上的绝食活动尽快结束，我也心急如焚。但绝食的同学要求现场直播，如果没有直播，即使是我同意对话，绝食也不会停止。最后我说，几点钟开始对话等我回政法大学与代表团商量后再通知中办信访局。下午两点我与沈彤先

现代教育出版社

到统战部，代表团其他同学留在政法大学等候我的电话。到统战部不久，郑幼秋来了，他说中央电视台的台长也来了，大家一起商量一下如何对话。当时绝食团的代表也在。商量的结果是，对话地点仍在统战部。对话时国内记者可入场，外国记者包括港台记者不可进入。由中央电视台对现场进行实况录像，每拍完一盒录像带（约一个小时）即送中央电视台播放，不得删改。录音也一样，每录完一盒即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尤其要在天安门广场的大喇叭中播出，由人民大会堂管理处负责。这种妥协，在学生方面来说已是作出了重大让步。我们主要考虑到绝食同学

的健康，希望能尽快举行对话停止绝食。商量好了以后我就与政法大学通电话，请二十名代表来统战部。结果来了四十余名，因为其他代表也坚持要来。我把这个数目告诉闫明复，他说可以。我又先到会场看是如何布置的，一看桌子是摆成正方形的一大圈。靠主席台一边是领导席，对面是学生席，两侧是记者席。我对统战部的工作人员说，这样摆不合适，一是中间距离太远，二是不合谈判规则。应该把两排桌子拼成一个长方形，领导与学生面对面各坐一侧。不设记者席，记者可以自由走动，以便摄影。工作人员当即重新布置。五月十四日下午四时四十五分，政

现代教育研究社

府领导与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的对话终于举行了。政府方面的代表是教委主任李铁映、统战部^长闫明复、监察部长尉建行、团中央书记刘延东，还有国务院的付秘书长等人。学生方面除了对话代表团的全体成员，还有五位绝食团的代表。闫明复首先讲话，之后找代表对话代表团作了简短的发言。我说这次对话是北京大学生用汗水、泪水和鲜血争取来的，来之不易。我们将对三个重大问题与政府对话并希望能得到切实解决。随后就是按我们的计划先由第一小组谈关于此次学运的性质问题，其次由第二小组谈关于宪法第35条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问题，最后

由第三小组谈关于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但在第一个问题上，政府方面始终不肯承认学运是爱国民主运动，只是含糊地说学生的爱国热情是好的。会议进行不久郑幼秋就走了。双方在第一个问题上真纠缠到七时一刻仍未有结束。这时广场上绝食的同学代表冲进了会场。她说对话从四点四十五开始，但到现在广场上还听不到对话的实况录音，电视的新闻联播节目也没有关于对话的报导，这是怎么回事？肖明复也很感惊讶，说：不是说好了的吗？来一盘放一盘，为什么不执行。而负责此项工作的郑幼秋却早就走了，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和会场负责录

现代教育研究社

音的工作人员说，没有得到通知要立即送电视台电台播放。面对这种情况，绝食团的代表要求我们暂停对话，等到有了电视实况转播再恢复。对话代表团的多数成员同意了这一建议。对话休会。上述事实表明不是学生在破坏对话。如果政府真有诚意的话，不在传播媒介上设置种种障碍，不在承认错误、肯定学生运动这一问题上吞吞吐吐，对话能较顺利地继续进行下去的话，整个学生运动的发展可能会是另一种情况。正是政府当中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有计划有预谋地不断扩大事态，为最后的血腥镇压制造借口。

一九八九年八月。